

中欧金融合作:动因、路径与前景*

——从贸易伙伴迈向全球合伙人

赵 柯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欧金融合作的过程、动因、路径以及前景进行了分析,认为欧盟国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中国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不仅意味着中欧金融合作经过多年努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而且也标志着中欧关系开始走向新的阶段:双方通过不断加强的资本纽带,正从传统的贸易伙伴逐步转变为全球合伙人。本文认为金融合作对于“锁定”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避免欧洲走向封闭的“大西方”,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欧关系 金融合作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全球合伙人

在中欧关系发展史上,2016年1月15日和16日,无疑将会成为一个重要节点,中欧金融合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也预示着中欧关系开始走向新的阶段:双方通过不断加强的资本纽带,正从传统的贸易伙伴逐步转变为全球合伙人。1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查克拉巴蒂(Suma Chakrabarti)时表示:“你此次访华,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①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当天公布的信息称,国务院决定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协定》并接受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理事会通过的《关于中国成员资格的决议》。外交部长王毅签署了加入书,外交部出具了法律意见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签署了股本认购函等函件。这意味着中国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相关法律程序已经完成,中国正式成为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员。^② 紧接着在第二天,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 本文系中共中央党校重点课题“世界格局变动中的中国话语权研究”阶段性成果;本文的研究、写作得到了中央党校人才强校专项基金的资助。

①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6-01/16/c_135014784.htm, 2016年1月25日访问。

② 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005523/index.html>, 2016年1月25日访问。

(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众所周知,亚投行具有浓重的“欧洲色彩”,57个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中有18个是欧洲国家,占近三分之一;特别是2015年3月,英国率先打破坚冰,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和G7成员国,此举引发了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竞相加入“亚投行”的热潮,亚投行也因此成为当时全球舆论的焦点和最热门的国际政治经济话题。连续两天之内,先是中国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紧接着具有浓重“欧洲色彩”的亚投行开业,这两件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欧金融合作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金融在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管理机制,通过对风险合理的分担和分摊来规避和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类挑战;而金融的核心运转机制是实现资产跨越时间和跨越空间的交换。所以,相较于贸易关系中商品和服务在交易对手间的流动,金融关系意味着双方将各自的短期风险和长期收益实现了有效的捆绑和融合,从简单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对手,转变为利益深度融合的合伙人。中欧相互加入由对方发起和成立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意味着双方通过制度化的风险和收益的共担、共享,面向全球去共同寻找投资机会,在“一带一路”的广阔天地下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这是中欧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欧金融合作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中欧金融合作具体的路径和方式是什么?在新形势下,金融合作如何影响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方向?

一 合作的起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动荡

早在2008年肇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经济领域里各国学术界和政策界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就是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认为流动性过剩蔓延已开始威胁国际经济和金融稳定。^①而美国自2001年以来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长期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根源,其中的核心传导机制是,由于美国国内过度消费和储蓄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经常项目赤字不断膨胀,为了弥补资金缺口,美国通过向全球资本市场出口各类金融产品来为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融资,这成为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引起全球美元泛滥的重要原因。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2.44%升至2005年的6.35%。同期,其经常项

^① 管涛:“全球经济失衡与流动性过剩”,《中国货币市场》2007年第3期,第6-11页。

目赤字规模更是从 2135 亿美元增至 7915 亿美元,扩张了 2.71 倍。^① 这导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压力,处在了动荡的边缘。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新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高额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了全球大量资本流向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屡创新高,人们沉浸在“新经济”带来的辉煌中,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周期性增长;盲目的乐观和非理性的预期所引发的疯狂投机造就了金融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新经济”的泡沫越吹越大。随着美联储上调利率收紧银根,到 2001 年 3 月 20 日,纳斯达克指数跌落至 2000 点以下,纳斯达克市场和纽约证券交易所损失的市值是 5 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美国 GDP 的一半。2001 年 11 月 8 日,美国权威机构——国民经济研究局正式宣布,美国经济于 2001 年 3 月陷入衰退,^②为持续了 100 多个月的“新经济”繁荣画上了句号。2001 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消费和投资持续低迷。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从 2001 年 5 月起,美联储连续 13 次降息,到 2003 年 6 月,将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基准利率)从 6% 下调到 1%,为 48 年来历史最低。^③ 特别是在“9·11 事件”后,布什政府不断推出减税措施以恢复人们对经济的信心。这些政策使美国经济渐渐回暖,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但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联储推行的低利率货币政策为美元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埋下了隐患;同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断增加的巨额支出,也使其财政状况日趋恶化,造就了所谓的“双赤字”问题。2005 年联邦政府赤字高达 3190 亿美元,2006 年略有好转,降至 2480 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也大幅攀升,2004 年占 GDP 的 6%,2005 年更高达近 8000 亿美元。此外,美国家庭储蓄率处于 20 多年来的最低水平,2005 年美国家庭支出超过税后收入,出现“大萧条”以来储蓄率首次为负值的局面。^④

从经济学的常识出发,如此庞大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将要求一个国家立刻调整其经济政策来恢复经济平衡,否则将导致其外汇储备耗尽,引发本国货币金融系统的严重危机,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衰退的境地。而过低的国民储蓄率,决定了只能靠吸引外来资本和大规模借债为经济增长注入资金。然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由此带来的“美元霸权”却可以使美国通过大规模发行债券来弥补赤字,用世界各国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来满足美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资本。对于美国所

① 管涛:“全球经济失衡与流动性过剩”,第 6-11 页。

② 庄芮:“美国‘新经济’的衰退”,《亚太经济》2002 年第 2 期,第 18-22 页。

③ 王宇:“9.18 降息后美国货币政策走向分析”,《中国货币市场》2007 年 10 期,第 16 页。

④ 王勇:《中美经贸关系》,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78 页。

享有的这种“美元霸权”所带来的好处,吉尔平分析得很清楚,“即使在冷战后的岁月,凭借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地位,美国仍然可以保持远远超出其财政能力的生活水平,并成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其他持有美元的国家相当于实际在给美国提供无息贷款。由于美国的债务是以美元来结算的,美国可以用通货膨胀来减免自己的债务,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的贬值减轻了美国的债务负担,却同时让日本和其他债权国蒙受巨大损失。然而,只要没有能被大家所接受的另一种货币取代美元,美元的持有者继续对美元保持信心,美国将继续享受铸币税所带来的特权”。^①

很显然,美国用债务货币化来获取资金的方法严重威胁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因为这段时期美元的过量发行不仅导致了美元持有者的财富大为缩水,并且强化了市场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出于保值的需要,过剩的美元流动性很大部分变身成为“热钱”,在全球寻找投机的机会,交易高度金融化的能源资源类商品首当其冲。比如,石油价格从2002年1月的20美元/桶上涨至2005年9月的65美元/桶,再到2008年7月的147美元/桶。^②正如弗里德曼所说,通货膨胀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这导致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能源与原材料商品快速上涨,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庞大的国际资本和金融利益集团对于这些处于价格上涨期的大宗商品过分投机,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贸易活动层层传导,形成了一般性商品和资产价格的上涨趋势,推高了全球性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开始形成。各国政策界和市场参与者都知道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开启的繁荣无法持续,终将危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有效协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使之有助于稳定世界经济,成为国际共识,同时也是必要的政策选择。美元泛滥也导致了世界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汇率不稳。由于美元的贬值速度远大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速度。所以2005年底至2007年11月23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达10.89%,但人民币兑欧元却贬值了9.59%,这无疑成为中欧之间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③而仅仅从2001年至2005年美元兑欧元就贬值了近三分之一。在事实上扮演着“锚货币”角色的美元的持续贬值也给欧美贸易造成了巨大的汇率风险,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公开表示,2007年至2010年期间,美元的贬值给其造成了30亿欧元的损失,因为空客的大部分成本是以欧元计价,但收入全部以美元计价。^④国际贸易对中欧经济发展

^① Robert Gilpin,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 The World Economy in 21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20.

^② 王丽颖:“2008年的石油有多黑”,《国际金融报》2014年02月10日第22版。

^③ 张明:“人民币升值能否缓解欧元升值压力”,《中国外汇》2008年第1期,第17页。

^④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http://www.cn.wsj.com/gh/20110118/BEU006023.asp>, 2016年1月19日访问。

都至关重要,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集团,而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的出口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双方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决定了美元币值的稳定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

面对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中国和欧洲的经济的发展无疑都处于风险之中。早在2005年,就有学者开始探讨中欧金融货币合作的可能性,认为中欧双方应该从汇率机制、本币结算以及资本市场联通等方面入手开展合作,从而能够未雨绸缪,及早为美国货币政策可能引发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危机做好准备。^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让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实质性”地进入双方关系发展的议程中。中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不仅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更使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中国政府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金融货币事务;而欧洲人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教训是要加强全球性的金融监管,让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运转更符合“欧洲规则”。同时,面对高失业率所带来的压力,欧洲需要尽快走出危机的阴影,恢复增长,而这些无疑需要中国的支持。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动荡,成为中欧金融货币合作的起点。

二 未竟之业:中欧改革全球货币体系的努力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陷入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要走出衰退的泥潭,重回经济增长的轨道,就要“对症下药”,这要求首先找到此次危机的“病根”。但对于此次金融危机根源的理解,各国的观点非常不同。在美国的决策层看来,“全球储蓄过剩”是导致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其内在机制是,贸易盈余国,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通过经常账户顺差积累了巨额储蓄,而这些储蓄又回流至美国,压低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利率,融资成本的降低大大刺激了美国金融业的过度杠杆化,最终形成泡沫引发危机。^②美国人把所谓的“病根”找到了,“药方”开起来也就容易了:为了避免再次出现金融危机,让世界

^① 丁一凡:“货币金融合作:中欧战略合作新武器”,《金融经济》2005年第6期,第16页。

^② Bernanke, Ben,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t the Sandridge Lecture, Virginia Association of Economists, March 10, 2005,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5/200503102/>, last accessed on 10 January 2016; Bernanke Ben, Carol Bertaut, Laurie Pounder DeMarco and Steven Kam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the Returns to Safe Ass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3–2007”,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Number 1014, February 2011,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pubs/ifdp/2011/1014/ifdp1014.pdf>, last accessed on 10 January 2016.

经济能够健康、平稳地增长,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盈余国应该承担起调节全球失衡的责任,要减少顺差,增加国内消费,同时让汇率浮动。按照美国人的说法,美国非但不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反而是受害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积累了巨额的过剩储蓄才酿成了此次危机;在欧洲人看来,过剩储蓄虽然是危机爆发的一个原因,但根子还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的缺陷:特里芬困境。^① 美国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很难抵制美元由此所享有的“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的诱惑,在国内利益和国际义务之间往往选择前者,结果是过度的货币发行量引发危机。所以,欧洲人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建立一个真正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美元之外让市场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样一则可以约束美国的货币政策,二则可以让中国这样的顺差国具有更大的空间来调整经济失衡和过热的压力。^②

欧洲人对金融危机持这种看法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切肤之痛。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欧美国普遍经历了一个“大通胀”(great inflation)的时期:增长乏力、就业恶化和物价上涨“三期叠加”。当时欧洲认为美国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供给迅速增长,美国人以过度消费的形式将大量的美元送入欧洲,但却没有生产出相应的出口商品来使这些美元重新回流至美国,这就造成欧洲美元泛滥的状况。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崩溃并不仅仅在于外汇市场的动荡,而是因为这一体系本身就具有通货膨胀效应,自然不可持续;^③而美国则认为通货膨胀源自欧洲内部,战后欧洲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工资的大幅提高,而欧洲建立的“福利国家”,又不可避免地使政府支出增加,进而引发通货膨胀,流入欧洲的美元仅仅是为欧洲国家的扩张性政策提供了条件,而与储备货币的供给机制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康纳利面对欧洲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诘难,能够非常轻松和不屑地以一句“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作为回敬。^④ 当时欧洲国家要求美国在短期内抑制其国内的过度需求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长远来看就是要限

^① “特里芬困境”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在1960年出版的《美元与黄金危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充当国际货币,那么一方面,随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规模的增加,对该国货币的需要也随之增加,这就要求该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来实现,但这就必然会带来该货币的贬值,从而打击其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必须要求货币币制比较稳定,维持信心,而不能持续逆差。这就使充当国际货币的国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让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无法持续。这被称为“特里芬困境”。

^② Lorenzo Bini Smaghi, “The Triffin Dilemma Revisited”,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ustainability and Reform Proposals, Mark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Robert Triffin (1911–1993), Brussels, 3 October 2011, <http://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11/html/sp111003.en.html>, last accessed on 5 January 2016.

^③ Otmar Emminger, “Infl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peech at the Per Jacobsson Foundation Lecture, Basel, 16 June 1973, <http://www.perjacobsson.org/lectures/1973.pdf>, last accessed on 2 January 2016.

^④ [美]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倪颀、曹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供应,对储备货币的发行、创造机制进行更有效的管理。欧洲人开出的“药方”是美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通过让其他国家购买和持有美元资产来解决自身逆差问题,不仅仅要德国,而且也要让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以及英国、加拿大和日本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由此,整个世界将进入美元本位,美国充当世界银行家的角色。^① 美国不愿意也不可能承担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负担。欧美之间关于国际货币政策的理念在本质上是冲突的,20世纪70年代愈演愈烈的国际性通货膨胀和美元长期的持续走弱的严峻现实,迫使欧洲人正视这一理念差异,不再幻想与美国人达成全球性的货币妥协,而是主动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对此进行回应,欧洲的货币一体化以及后来欧元的诞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现实的。

很显然,在对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根源的诊断上,中欧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也符合中欧的共同利益。首先,无论是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中国还是作为世界上最大贸易集团的欧盟,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这就要求作为实质上处于“锚货币”地位的美元币值保持稳定。所以,敦促美国履行其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际义务,约束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是中欧的共同诉求。其次,中国和欧洲都希望避免出现美元突然崩溃的危机。一旦美国债务规模的积累超过了债权国能够容忍的程度,美元信用突然出现危机,美元资产被大量抛售,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世界经济体将遭受重大的打击。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得到纠正的情形,是中国和欧盟都竭力希望避免的,双方都希望能够以相对公平、平稳的方式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为此,双方都希望国际货币体系能够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变得更为多元、合理,同时要促成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全球财经金融政策层面进行协调合作。在2008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华盛顿峰会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要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在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胡锦涛进一步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要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中国政府的这一倡议得到了欧洲人的回应。2009年7月,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应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多元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他希望全球领导人对国际货币体系问题进行讨论,特别是讨论汇率问题和实施一种基于多种货币而非美元单一货币的“多元货币体系”的可能性。萨科

^① Memorandum for President: “US Position in Trilateral Negotiations”, Feb.23.1967, LBJL, Bator Papers, Box 4, Quoted from Hubert Zimmermann, *Money and Security: Troops, Monetary Policy, and West Germany'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1950-197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18.

齐特别提到:“目前,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布雷顿森林协议的产物。60年后,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政治上多极化的世界难道不应该有一个与其相适应的货币上多极化的世界吗?”^①2010年12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中国与欧盟经贸高层对话中,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为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参加会议的欧盟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雷恩当日向媒体透露,中国和欧盟就改善国际货币体系达成了一致,^②虽然会议并未公开双方达成共识的具体内容,但这至少说明中国和欧盟都认识到了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巨大缺陷,并愿意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共同努力。法国更是把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为其2011年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任内的主要目标,为了获得中国的支持,在2011年3月,法国特意在南京举行了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级别研讨会。

然而,中欧此次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努力,成果非常有限。在法国戛纳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并没有提及约束美元“嚣张的特权”,也没有就各国汇率的协调问题形成决议,更没有正式讨论扩大SDR(特别提款权)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范围,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可以代替美元、承担计价和储备功能的国际货币。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难度非常大,另一方面也在于欧洲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受益者,其改革的意愿和动力并不十分充足。更为重要的是,在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的冲击下,欧洲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强,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首先要触动的就是美国的利益,这让欧洲人很难在这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③但是,中欧之间的金融合作并未就此止步,双方及时调整了合作的方向和路径,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三 开辟新路径:中欧资本的互联互通

由于货币所具有的天然权力属性,金融货币合作注定将是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它既能够为合作双方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最容易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和猜忌。所以,合作路径的选择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就中欧双方而言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路径。第一种可称为战略导向型,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将直接导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如此,双方将更多地采取政治合作的方式,比如

^①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7/10/content_11688107.htm, 2010年12月25日访问。

^②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12/22/c_12906683_2.htm, 2010年12月25日访问。

^③ Miguel Otero-Iglesias and Ming Zhang, “EU-China Collaboration in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Much Ado About Nothing?”, *World Economy*, Vol. 37, Issue 1, pp.161-166.

在改革 IMF 治理结构的前提下,协调双方在 IMF 中的立场,共同推动 SDR 使用范围的扩大和发行量的增加,特别是通过使用 SDR 作为部分大宗商品的计价单位,来稳定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积极实现 SDR 在私人部门的使用;也可以通过政府间协议的形式转换双方的外汇储备和贸易往来所使用的币种,改变目前美元“一币独大”的局面。第二种为需求导向型,这是指在互利的原则下通过解决彼此在金融货币领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逐步扩大人民币和欧元的使用范围,主要采用经济合作的方式,着力点在于加强中欧之间的资本纽带,但主要以市场的力量推动。很显然,第二种路径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不太容易遭遇政治阻力,并且合作的主体是中欧双方的企业,中欧之间庞大的贸易量和不断增长的相互投资为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需求空间。^① 近年来中欧以加强资本纽带为切入点,开辟了以中欧资本互联互通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合作新路径。

第一,推动中欧资本市场的对接。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传统上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而发展中国家则往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接受者,但中国却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吸引外国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对外投资国,仅仅过了一年,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就已经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位列全球第三。^② 更为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从之前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资源型国家,迅速扩展到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可以用“跳跃式”来形容。根据《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2004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仅为0.73亿美元和5.37亿美元,而到了2012年则分别达到了61.2亿美元和315.38亿美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增长了几十倍。自2010年以来,中国对欧盟投资已连续多年超过欧盟对华投资。^③ 资本流动的规模增大,速度加快,必然要求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中欧双方在资本市场的对接方面合作潜力巨大。欧委会2015年1月28日启动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资本市场联盟(CMU)计划,旨在建设28个成员国的资本单一市场,消除跨境投资壁垒,降低欧盟内部融资成本。欧洲的金融体系更加“以银行为中心”。欧洲企业融资超过80%的资金来自银行,其余来自资本市场。^④ 欧洲人现在认为,基于资本市场的融资体系不仅

① 赵柯:“中欧如何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合作?”,《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第60-61页。

② 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309/20130900311767.shtml>, 2016年1月12日访问。

③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0/11/c_117671320.htm, 2016年1月2日访问。

④ 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502/20150200887376.shtml>, 2016年1月10日访问。

能够使经济更快地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还可以有效地避免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同样也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①这和欧盟目前要做的是非常一致的,中欧在推动双方资本市场连接方面具有共同的意愿和理念。随着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的增多,当前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利用欧洲资本市场融资了。眼下在欧洲,利率处于极低水平,在欧洲资本市场融资能够大大节省成本。2013年,中海油首先开河,发行欧元债券,^②2014年,国家电网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的香港子公司总计发行了价值16.3亿美元的欧元债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也发行了5亿欧元(约合5.7亿美元)的债券。^③随着中国企业在欧洲业务的增多都需要用欧元结算,在欧发行企业债,不仅节省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知名度,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欧洲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地位提高,中国资本“走向欧洲”,用资本的纽带将中欧企业、中欧市场联系起来,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意义重大。同时,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欧洲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会越来越多到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逐步实现中国和欧洲两个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

第二,促进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改革。对于中欧在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方面的必要性,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有过清晰的表述:“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国是快速增长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不断加深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加强中欧双方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协调,有利于维护中欧乃至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促进全球治理结构改革。”^④中欧的金融合作没有停留在口号上,中国对于选择欧洲作为自己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伙伴,是充满信任的,这种信任体现为实实在在的支持。易纲表示:“欧元和欧洲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外汇储备最主要的投资领域之一。按照多元化和分散化原则,外汇储备投资欧元政府债券,不仅有利于维护欧洲金融稳定和国际金融稳定,也能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从而有利于我国外汇储备的总体安全和保值增值”。^⑤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对欧元资产的投资,为市场恢复对欧洲的信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欧洲同样也支持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诉求,当前中欧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合作虽然不再直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但是却在内容上更为务实,基本上遵循

①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35.htm, 2016年1月10日访问。

②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0/12/c_125520359.htm, 2016年1月10日访问。

③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http://cn.wsj.com/gb/20150216/fin101047.asp>, 2015年3月10日访问。

④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1/06/c_12953827.htm, 2016年1月2日访问。

⑤ 同上。

着“边际改革”的原则。^① 作为现有国际金融货币制度的接受者,中欧双方并没有放弃对其加以改善的努力。在国际机构改革问题上,欧盟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治理结构改革作出了切实贡献,同意放弃高估的部分份额及执董会中的两个席位,促进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代表性和发言权的提高。在美国国会执意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通过的情形下,欧洲国家一直敦促美国履行承诺。201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IMF 2010年改革方案。这标志着2010年改革方案在拖延多年后将正式生效。由此,IMF份额将增加一倍,从2385亿SDR(特别提款权)增至4770亿SDR,并实现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转移份额6个百分点。其中,中国份额占比将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② 欧洲也支持人民币加入SDR的货币篮子,这都使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此外,为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同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欧洲还是中国建立海外人民币清算安排最多的地区;在政策协调层面,中国政府与欧盟,以及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都建立了机制性的财金对话,这为中欧之间沟通和协调全球金融治理事务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和平台。

第三,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2015年6月30日,中法两国签署了《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这是国际上首次以“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主题签署的合作协议。实际上,近年来“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已经成为中欧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方向,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就是用资本纽带将中欧各自的优势产能进行对接,面向全球开拓新的市场。所以,打造中欧之间稳固、灵活的资本纽带是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国家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则通过接受中国加入该行的决议,同时双方还决定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通过这一系列的金融机制安排,中欧之间真正地实现了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强韧有力的资本纽带将使中欧成为全球合伙人,在广阔的亚欧大陆、拉美和非洲寻找更大的投资空间。在国际贸易中,商品虽然是跨国流动的,但商品背后不同国家的“人”却可以不见面,货物和贷款按合同约定及时到位即可;但投资与贸易不同,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不同国家的社会连接在了一起,为了保证商业上的成功,投资各方必须去主动理解和适应对方的法律规范和风土人情,资本背后的“人”必须要面对面的交流,这实际上意味着不同国家间的社会

^① 这是张宇燕在接受《瞭望》杂志采访时提出的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要遵循的原则,意思是有条件接受和参与对发达国家更有利的秩序,并不意味着不去改变,而是在边际上逐步地改进。在建立新的、更公正和更合理的国际秩序过程中,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和“积小胜成大胜”的耐心。<http://www.lwgcw.com/NewsShow.aspx?newsId=19007>,2016年1月9日访问。

^②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12/20/c_128548528.htm,2016年1月10日访问。

在融合,这是单纯的贸易所达不到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但是“民”如何“亲”呢?双方的投资和金融往来为此提供了重要渠道。因此,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相互投资对稳固国家间关系的贡献度要远高于贸易。

当然,要让中欧资本互联互通能够“梦想照进现实”,还需要克服制度和观念上的阻碍。首先,实行单一货币后,一系列的机构和制度被设计和建立来确保欧元的顺利运行,但关于欧元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却相当分散,欧盟实际上并不能有效地对外代表欧元。与欧盟进行在金融货币事务方面的合作,中国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欧元代表机构,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状的和多层次的治理体系。这种复杂的治理结构,使得中欧货币金融合作仅仅在技术和程序层面就面临挑战。其次,欧盟对于中欧金融合作抱有较强的戒备心理。货币金融合作虽然潜力巨大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但由于其在政治经济运行中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地位,更容易触动欧洲人敏感的神经。

四 结语:以金融合作“锁定”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2016 新年伊始,英国《金融时报》就刊发了其欧洲版主编托尼·巴伯(Tony Barber)的评论文章,题目也足够吸引眼球,叫做“欧洲衰落应引起全球关注”。^① 巴伯在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写道,由于欧洲各国政府、欧盟机构看起来似乎都越来越无力应对同时来自各个方向的众多挑战,欧洲的衰落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巴伯之所以认为欧洲的衰落要引起全球的关注,因为这不仅仅说明欧洲人难以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更在于,作为大西方的核心力量,欧洲的衰落预示着整个西方社会在全球文化、经济、政治及技术领域丧失优势;巴伯担心这一趋势让西方人熟悉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2015年11月份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就发生在音乐厅、体育馆和咖啡厅等这些象征现代生活方式的地点),降低了人们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任,削弱了西方国家政府的行动能力。在国内,许多观察家在谈论“欧洲衰落”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设置了一个参照系:中国的崛起。似乎欧洲的衰落更加反衬出中国的强大,中国对此应“乐见其成”。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衰落的欧洲真的就符合中国的利益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不得不再追问一步,欧洲真的衰落了吗?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欧洲?

对于欧洲是否衰落,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怎样的欧洲才符合中国的利益?习近平主席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对这个

^①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546>, 2016年1月5日访问。

问题给予了精彩的阐述。他说:“我们要建设增长繁荣之桥,把中欧两大市场连接起来。中国和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是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要积极探索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①从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可以看出,中欧关系的定位和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而是着眼于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为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持久、可靠的动力。所以,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繁荣的欧洲,而不是一个衰落的欧洲。只有一个繁荣的欧洲才有能力同中国一起,一东一西形成合力,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新的活力,实现亚欧大陆的经济整合,让各类生产要素在亚欧大市场内自由流通,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相反,一个不断衰落的欧洲不仅无法提供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经济动力和活力,并且长期的衰落会逐渐改变整个欧洲的气质,由开放、包容、温和逐渐滑向封闭、狭隘和偏执,这对致力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而言,显然不是什么福音。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当一个经济体从繁荣走向衰落之时,会越来越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会越来越热衷于构建自我保护的狭隘经济集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英帝国在一连串危机的打击之下,失去了自信,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转向在英联邦内建立更为封闭的“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其他国家也纷纷群起而效仿,整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被分割成为一个个“势力范围”,各国竞相采取排他性的对外经济政策,这导致各国间政治互信恶化,继而开始军备竞赛,最终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无论是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现实的利益来看,中国都真诚地欢迎欧洲走出危机的阴影,保持其一贯的繁荣。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欧洲时代”,欧元横空出世,成为可以与美元一争高下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欧盟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东扩,成功地从 15 国扩大到 27 国,欧盟人口增加到近 5 亿,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不仅极大地得到了扩展,欧盟的东部边界也从柏林移到了华沙,欧盟核心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大为改善。当时,无论是欧洲的政治精英还是学术精英,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是“欧盟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强调欧盟以自身经济力量、国际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为代表的软实力与美国以军事实力、霸权支撑下的单边主义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不同,强调欧盟是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一支战略力量。欧盟踌躇满志地试图用软实力来重新构造世界秩序。那时的欧洲显然是充满自信的,在对外政策上也更具包容性和远见卓识。2003

^①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01/c_1110054309.htm, 2016 年 1 月 2 日访问。

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洲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欧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然而,2009年的欧债危机以及随后的乌克兰危机无异于给了欧洲的精英阶层一次巨大的打击,他们意识到欧洲在变化的世界中是如此脆弱,如此地易于受到伤害,意识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具有如此强大的竞争力。欧洲不再像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时那么的自信,他们意识到欧洲并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大西洋,投向了大西方,试图通过加强跨大西洋联盟来保护自身免遭外部世界的威胁,巩固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既有地位。2015年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美国时表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高于其他一切(伙伴关系)的伙伴关系,对德国而言是不可放弃的。我相信,我也可以代表欧洲这么说。”^①作为当前欧盟事实上的“盟主”,德国领导人的这番表态典型地体现了当前欧洲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心态和考量。于是,我们看到欧盟在政治上越来越倾向于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忠实支持者,经济上全力推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的谈判,积极地推动欧盟与日本自贸协定的签署。与之相反,中欧双方互为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对于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显得犹豫不决。在2016年1月13日举行的欧盟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决定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事时,欧盟选择的是推迟决定。显然,一个失去自信、在对外经济中走向封闭、在战略上加速倒向美国的欧洲是中国不愿看到的,中国需要一个繁荣而自信的欧洲,需要一个有自信以更具包容性和长远眼光看待中国未来发展的欧洲。所以,中国对欧战略的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政策工具来“锁定”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避免欧洲走向封闭的“大西方”。而金融合作除了提供给双方经济红利外,还用强有力的资本纽带将中欧引向全球合伙人的道路,让中欧关系中的“战略性”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正因为此,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6月29日出席中欧工商峰会时特别提到:“让金融合作成为双方利益融合的牢固纽带”。^②

(作者简介: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德国《世界报》网站, <http://www.welt.de/politik/ausland/article137289651/Am-Ende-bringt-Obama-das-Merkel-Argument.html>, 2015年3月10日访问。

^②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30/c_1115760599.htm, 2016年1月3日访问。